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正军 崔莹莹

延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加剧与党的自身建设亟待加强的双重考验,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高度的理论自觉,逐步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自我革命路径,形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谨、特征鲜明的自我革命实践形态,构建起政治领航、思想指引、组织领导、纪律约束、作风引领“五位一体”的实践格局。这一探索有效破解了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各类复杂难题,清除了党内隐患和消极腐败因素,保持了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展现出党高超的自我革新能力,在淬炼党性修养、完善治党方略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充分彰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自我净化、勇于革新的鲜明政治本色与优良政治品格。

一、把学习教育作为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

学习教育是筑牢党员政治信仰的基础工程,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学习中明理、在实践中增智、在斗争中强党性,把理论修养、历史认知与现实考验紧密结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艰苦环境中砥砺品格,真正实现了从思想到行动的深刻蜕变,为党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既是无产阶级政党把握历史主动、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前提,也是延安时期全党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斗争本领的现实要求。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在这一背景下,陕甘宁边区逐步形成全面系统、统筹推进、有序开展的学习格局。

二、把群众监督制约作为保障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

群众监督是人民群众对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言行、权力运行开展的监督,是党外监督的重要形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群众监督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遏制官僚主义滋生的极端重要性。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以法规形式赋予群众当面批评、质询、检举的合法权利,让权力时刻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形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民主氛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勇于自我革新的政治品格,呈现出延安时期党群同心、血肉相连的生动局面,印证了群众监督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把钥匙”的强大生命力。

三、把反腐倡廉作为巩固自我革命的重大任务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政治操守,是检验党员党性修养的试金石,更是我们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制胜法宝。延安时期,我们党始终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人民信任,以公道正派的作风凝聚磅礴力量。坚守廉洁奉公,就是要恪守纪律规矩,永葆公仆本色,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确定了各级政府干部任用的四条标准,其中之一就是“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该条例还规定,凡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获罪有案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论何人,都没有担任干部的资格,从干部准入环节筑牢廉洁关口,遏制贪腐问题滋生。边区对贪污行为作出清晰界定、坚持从严查处,对贪腐违纪案件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落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要求。以铁的纪律严格规范党员干部言行,坚决清除腐化变质分子,有力维护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系列刚性制度与严格执纪,有效净化了党风政风,破除了旧官僚习气,营造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正氛围,构建起廉洁高效、深受群众拥护的民主政权,为党赢得民心、壮大力量筑牢了坚实根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与经验研究”(编号:24XDJ009)的阶段性成果。

政绩的人民性坐标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历史逻辑、价值维度与实践转化

北京邮电大学 李敏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归宿。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一部署植根于我们党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彰显我们党持之以恒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追求。

一、“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为老百姓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绩观的价值原点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而确立,成为我们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早期范本”。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建设、解决温饱问题的过程中一心为民,将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指引下,找到了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为民造福”的现实路径。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把“为民造福”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使得“为民造福”有了具体的实践指向。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坚持正确政绩观是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政绩内涵不断丰富,评价标准从模糊笼统走向具体可感,受益范围由局部群体扩展至全体人民,政绩观的每一次转型都是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

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新时代政绩观的价值维度始终紧扣“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主题。

人民性是正确政绩观的本质属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我们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党干事业、创政绩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如果脱离了为民造福,其他所谓政绩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决定了高质量发展正是将“为民造福”落到实处的根本路径。为民造福是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高质量发展则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为民造福的根本路径。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要依靠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来推进;而发展成果必须找到具体的落地载体,增进民生福祉正是将人民立场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核心着力点。广大领导干部要立足本职岗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立足当前,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把群众现实需求作为履职干事的出发点,在回应群众期盼中厚植为民责任。政绩成果是否真正惠及人民、造福人民,最终须由人民来检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形象比喻,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政绩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人民满意是政绩评价的根本标准。政绩成效不应以干部的自我总结、材料汇报为依据,而应以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是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检验标准,检验一切工作的实际成果,看群众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三、“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实践转化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不能停留于理念宣示,而必须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治理行动。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但在个别地方和部门,政绩观偏差问题依然突出。党员干部要真正践行“为民造福”的宗旨,就必须以思想自觉筑牢根基,以真抓实干检验成效,以制度保障巩固成果。首先,要加强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端正政绩认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干部要将“为民造福”从口号转化为自觉行动,必须在思想深处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的根本问题。加强学习教育,正是筑牢这一思想根基、提升为民境界的根本途径。其次,要通过真抓实干,增强“为民造福”的工作能力。为政之道,贵在落实。党员干部唯有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以过硬的工作能力推动民生福祉落地生根,才能真正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最后,完善配套制度体系,构建为民造福的长效保障。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为民造福既需要思想自觉和实干担当,也需要一套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来巩固成果、保障长效。唯有以制度之力匡正政绩导向、压实为民责任,才能推动“为民造福”从阶段性行动转化为常态长效的治理效能。

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生成逻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史嘉慧

文化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议题,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维度,系统阐释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在生成逻辑,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展提供学理参考。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逻辑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守正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他们同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自身政治统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则提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新的文化使命的主体担当。这一使命的历史开创性和现实艰巨性,决定了它必须由一个能够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强大组织能力的主体来承担。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确保这一使命有明确责任主体的内在规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保障。“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但这一结合并非自发实现,它是在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没有党的领导,“第二个结合”就容易迷失前进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二、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逻辑

在聚焦救亡图存主题中夺取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五四精神,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广泛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抗战时期,党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以纠正错误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党还依靠“文化军队”,借助传单、宣讲与创办《中国工人》等报刊读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思想,催生了《黄河大合唱》《保卫我们的土地》等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

在服务国家建设中巩固文化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并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国家开办农民、干部等培训学校普及文化教育;广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净化了社会风气;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追鱼》《文成公主》《林海雪原》《战斗里成长》等作品不断丰富主流精神文化内涵。

在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深化文化领导权。为有效推动各项改革事业顺利开展,必须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继被载入党章,为文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党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五讲四美”、学雷锋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入新时代,出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涵养向上向善、和谐文明的社会风尚。

三、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逻辑

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以及虚拟现实等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一个愈发复杂的舆论场,这一舆论场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匿名性与复杂性等多重特征。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站稳党性立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抵御错误思想文化侵蚀。

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然而,兼具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产品,天然存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矛盾:承载主流价值的优质文化产品公共属性突出,经济收益有限,单纯依靠市场自主供给,容易出现供给短缺问题;而追求感官刺激的低俗文化产品变现速度快、流量收益高,容易在资本逐利逻辑下不断扩张泛滥。若缺乏党的领导与制度规制,文化市场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党的领导是文化市场发展的有力纠偏,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沿着正确道路繁荣发展的保证。

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了“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阶段性任务。为此,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

正是在党中央对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重视下,文化建设领域才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用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发展进步,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